

九一八事变前后 苏联对日政策再解读

沙 青 青

摘 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无论是挑起战端的日军, 还是奉张及南京当局都密切关注莫斯科对此事变的外交态度。虽然面对中东铁路可能遭遇日军威胁的严峻情势, 但苏联依旧采取“不干预政策”, 坐视日军侵占中国整个东北地区。1932年后, 苏联甚至第一时间便承认“满洲国”并开始与日本商洽中东铁路的售让事宜。斯大林及苏联最高当局之所以做出这样一系列的外交决策, 除了受制于国际层面的大背景外, 也与苏联当时已逐渐成型的外交模式有关, 而且期间更掺杂了诸如情报缺失、预判失误等历史细节因素。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苏联外交 不干预政策 斯大林

一、引 言

1931年9月18日深夜, 日本关东军虎石台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沈阳以北7.5公里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引爆事先安放的炸药, 炸毁了一段铁路。爆炸发生后, 关东军立刻声称这是中国军队所为, 随即兵分两路进攻东北军驻防的北大营, 挑起九一八事变, 正式揭开日本武装侵占中国东北诸省的序幕。

事变之初, 国人普遍认为作为东北地区传统利益攸关方的苏联势必会竭力维护其在东北的权益。何况日本原本就是苏联在远东的头号宿敌, 如何应付日本势力的扩张历来都是其远东政策之要务, 而中国东北便是苏联抵御日本威胁的第一道“防波堤”。而且, 基于两年前“中东路事件”中苏联的反应, 不少人士相信苏联会利用九一八事变实施干预。中国各地报纸纷纷预测苏联可能会采取干预行动: “道里亚苏俄军已开始行动, 显欲增固边防”、^①“俄将进兵东路, 借口华军无力护路”、^②“日军暴行未已, 俄声言进兵”、^③“俄外长正式通知日本大使: 苏联对日本向中东路继续进兵, 已不能再取旁观态度”、^④“俄日双方均有挑衅, 行为局势恶化”、^⑤“苏俄将

① 《苏俄准备出兵护路》,《民国日报》1931年9月21日,第4版。

② 《俄将进兵东路, 借口华军无力护路》,《申报》1931年9月22日,第4版。

③ 《俄声言进兵, 以日军扰乱东路为借口》,《中央日报》1931年9月22日,第3版。

④ 《苏联通告日本, 反对再进兵中东路》,《大公报》1931年9月25日,第3版。

⑤ 《苏俄声称: 对满洲不作旁观者》,《中央日报》1931年9月23日,第3版。

出兵十万与日宣战，日军在四平街增兵袭哈埠”，^①等等。不仅中国舆论认为苏联会进行干预外，很多欧美主流报刊也一度以为苏联可能会武力介入，如《纽约时报》便曾进行过一系列报道，如“苏联威胁将在满洲采取行动”、^②“苏俄派遣武装人员支持奉系抵抗日人侵犯”、^③“苏联远东集团军正在备战以应对白俄进犯”，^④等等。

除国内外舆论界对苏联反应所做的揣测外，奉天及南京当局对苏军重兵集结于中苏边境地区同样疑虑重重。他们均怀疑苏联可能会对满洲时局进行直接干预。^⑤但是，事态的最终发展却完全出乎各方之最初意料——苏联非但未出兵干预，反而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对日本吞并整个东北地区的行为无动于衷。时至1932年4月，莫斯科已于第一时间承认“满洲国”，之后甚至与日本商洽中东铁路售卖事宜。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驱使苏联向日本做出一系列如此重要的让步呢？这一系列的退让，究竟是苏方一以贯之的既定策略？还是迫于无奈的应对方式？

在尝试解答此疑问时，以往的研究者常持一种二元论调：一方面，苏联基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考虑，自然坚决反对日本的军事侵略，极为同情中国的遭遇；另一方面，苏联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始终未能下定决心来全面支援中国抗战或亲自出手制止日本的侵略扩张。采纳此类观点的学者大都认为苏联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存在着一个由“同情支援”转向“妥协退让”的变化过程。于是，便不外乎得出如下论断：苏联所采取的政策乃是“国际主义”向“国家利益”不断让步的结果。^⑥

除此说法外，也有人认为苏联的不干涉政策绝非“国际主义”向“国家利益”妥协的结果，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通过奉行绥靖政策，使中日陷入长期战争敌对的状态，从而解除苏联远东地区的后顾之忧。剔除意识形态的因素，此类看法也非完全空穴来风。若依照此种理论，九一八事变初期苏联的中立态度或可归咎于莫斯科方面的权宜之计。然而，在承认“满洲国”以及售卖中东路等重大问题上，莫斯科步步退让的举动也容易让人们产生更多困惑。^⑦

① 《日俄形势日趋紧张》，《中央日报》1931年9月24日，第3版。

② “Soviet Threatens to Act in Manchuria,” *New York Times*, 25 October 1931, Front Page.

③ “Soviet Far Eastern Army Reported Preparing for an Attack,” *New York Times*, 31 October 1931, Front Page.

④ “Soviet Sends Arms to Aid Manchurians in Opposing Japan,” *New York Times*, 27 October 1931, Front Page.

⑤ “王瑞华为苏联在大乌力集结兵力事致张景惠等代电（1931年9月24日）”，辽宁省档案馆编：《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5—377页。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各方舆论的揣度，苏方还透过官方渠道向中国方面表示“近日增兵中苏边境确为自卫并无仇华之意”，参见“莫德惠为苏联增兵中苏边界实为自卫等事致张景惠电”（1931年9月25日），辽宁省档案馆编：《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第384页。除奉系为之不安外，南京方面也始终担忧苏联可能以各类借口“趁火打劫”。即便是在莫斯科宣布“不干涉政策”后的11月初，蒋中正还因外蒙边界纠纷问题认为：苏军干涉“为势所必然，余固早料及之也”，参见“1931年11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2册，台北：“国史馆”，2006年，第221—222页。

⑥ 持这类观点者在国内仍为主流，可参见尤东晓：《试析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日本研究》1997年第2期，第43—48页；马越山：《评九一八事变前后苏联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及其影响》，《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22—25页；王真：《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中日冲突的不干涉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第26—37页；易新涛：《九一八事变与苏联对华政策的缓慢转变》，《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第7—10页。

⑦ 对苏联在“满洲国”与中东路问题上的态度，中国学者大多持与九一八事变类似的论调，即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存在着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其相关外交政策动摇与妥协。

这很自然地引发了进一步的疑问：莫非苏联真是有计划地放弃东北以便使日本锋芒指向中国？

上述两种论调看似截然不同，但我们仍可发现两者在分析模式上的共同点，即都关注于宏大的历史背景，多从苏联国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抑或从苏联在远东的宏观战略角度出发，希望借此分析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东北问题态度的转变。^①再比如，不少研究者在谈及苏联不断对日妥协的远东政策时，常将原因归结为苏联需集中精力应付来自西线的德国威胁。但需指出的是，这种解释并不适用于1933年前的国际形势。在此之前，纳粹尚未上台执政，而德国的军备重整则要等到1935年之后。^②单以九一八事变而论，苏联为什么会在西线没有面临直接压力的情况下，却选择默认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又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先后承认伪满洲国并出售中东铁路？莫斯科究竟是如何研判九一八事变的性质？为何会得出这种判断？而其所采取的行动又到底是基于怎样的具体动机呢？

在回答这些疑问时，除需要了解时代大背景的演变趋势外，也应关注那些事变发生前后的即时性因素。虽然这些历史细节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可能有助于我们挖掘历史事件背后的因果逻辑延展。近年来，随着苏联档案等相关资料的逐步开放和整理出版，我们有机会窥视当时莫斯科内部决策之实态，研究者也有可能立足全新的角度来解答上述疑问。本文主要借助近年来陆续公开、出版的相关档案资料，希望集中讨论苏联于九一八事变前后对中国东北局势所持态度的演变过程，继而尝试探究其背后另一条隐秘的事件脉络，使之与传统解释模式互为补充。

二、“中国将出现麻烦”：苏联在华势力的萎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第一时间在公开场合宣称：“此次中日冲突为不可避免之事”，还进一步表示：日本的军事行动并非只针对中国，其主要目标乃是苏联，所以苏方对此事变爆发早有预期。李维诺夫甚至表示：苏联在远东地区已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军事准备，完全有能力应付任何边境事端。^③然而，实际情况却与苏联公开言论截然相反——该事变的爆发完全出乎莫斯科之意料，莫斯科此后更无从知晓中国东北地区局势的走向。

1931年9月20日，事变发生两天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听取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关于中国东北局势的报告并商讨对策。虽然情况紧急，但由于缺乏准确情报，致使联共（布）政治局既未能迅速做出任何决定，也无法判断此事件的性质——究竟是类似中东路

① 时至今日，西方学者在讨论苏联对外政策时也很难避免意识形态的歧见，同时也常会把“意识形态”的考量看作是左右苏联对外关系中最重要因素。美国著名苏俄问题专家、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就将苏联的对外政策比作是十字军式的意识形态扩张，这在冷战前的西方学界是相当典型的认知。参见 Condoleezza Rice,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Grand Strategy,” in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5-164. 另可参见 George Alexander Lensen, *The Damned Inheritance: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nchurian Crises, 1924-1935*, Tallahassee: The Diplomatic Press, 1974.

② 事实上，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苏德之间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926年，苏联就和魏玛政府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事后，苏方曾评价该条约使双方关系超出了“通常的贸易关系”。参见“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ССР в 1925г.,”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ом 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ого дома, издания 1964, pp. 619-620 с.

③ “王瑞华为据报苏联对日本进攻中国早已预料并有相当之准备事致张景惠代电（1931年9月23日）”，《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第349—350页。

事件的局部武装冲突,还是日军与张学良的全面冲突?日军究竟只是想教训一下张学良,还是会一举将其推翻?日军究竟会不会进兵北满继而威胁中东路?

会议结束时,联共(布)政治局未得出任何结论,只得被迫推迟做出决议。随后,政治局立刻要求加拉罕及相关部门尽快去搜集有关东北事态的最新情报。^①然而,直到9月22日,莫斯科依旧未能弄清东北地区的实际状况,更不了解日军是否有进一步扩大事态的意图。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只得直接向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请示具体对策。^②他们在电报中坦称:对日本的行动情况及此时中国东北的局势完全不清楚。^③

按理说,作为东北地区利益攸关方的苏联理应迅速采取行动以维护自身利益。但是,事变爆发后,莫斯科的决策层却在第一时间陷入停滞,既不知晓当地事态的来龙去脉,也无法预测事件可能的走向,以至于未能在第一时间做出任何有效决策。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在事发之初陷入不知所措的窘况呢?虽然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回答此问题,但1930年前后苏联在华情报网的瓦解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为保卫国家安全,苏联曾长期在其周边国家经营着庞杂的地下情报网络。除了外交机构和专业情报机关外,共产国际也是整个苏联对外情报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④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加强了共产国际的集中化原则,把各个成员党变成其附庸。^⑤会上,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特别指出“保卫苏联应该置于消除军事危险斗争的中心”。^⑥1924年斯大林上台后,共产国际的角色早已不再简单局限于输出革命的“传教士”,而是更多地肩负起为苏联“站岗放哨”的重任。^⑦此外,斯大林还进一步要求:共产国际驻各国的组织均应服务于苏联对外情报工作。^⑧随后几年间,散布各地的共产国际组织逐渐蜕变为“进行破坏活动和情报工作的干部的供应者”,^⑨从单纯的共产革命的“播种机”演变为莫斯科最重要的情报搜集机构之一。^⑩中国的情况自然也不例外,东北地区更成为苏联情报网构筑的重中

-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3号记录(1931年9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 ② 根据《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的记录显示,斯大林应于1931年8月7日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前往索契度假,直到10月11日才返回莫斯科。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委员会编译:《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8—79页。
- ③ “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31年9月2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34页。
- ④ 在华的苏联情报网络主要由三大系统组成,分别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农红军情报总局及共产国际。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各情报机构的网络常常会建立在中共各级组织的基础之上,甚至彼此重叠。
- ⑤ 相关描述可参见赫尔穆特·格鲁伯:《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国际内幕》,达洋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
- ⑥ 维克托·乌索夫:《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赖铭传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 ⑦ 该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局势所施加的具体影响,可参见杨若云、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 ⑧ 共产国际在中国各地的情报网点远胜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工农红军情报总局。相关研究参见Christopher Andrew and Julie Elkner, “Stalin and Foreign Intelligence,”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June 2003, pp. 69-94.
- ⑨ 维克托·乌索夫:《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第28页。
- ⑩ 关于共产国际与苏联国际情报网的研究可参见Kevin Mogan, Gidon Cohen & Andrew Flinn, eds., *Agents of the Revolution: New Biographical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Bern: Peter Lang AG, 2005.

之重。^①

自1926年起,奉张势力与南京当局先后对苏联在华的各类组织展开了一连串打击:1926—1927年间,苏联驻北京、广州、上海及汉口等地的以外交机构名义为掩护的情报机关也纷纷遭到袭击,“使得情报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只能提供城市情报工作,而且情况很糟糕”。^②为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莫斯科曾紧急通电苏联外交机构尽快检查所存档案,销毁那些可能有损苏联名誉的文件。之后,随着局势的恶化,莫斯科方面甚至建议布留赫尔(V. K. Блюхер,即加伦)等高级干部尽快销毁自己的档案,^③同时又进一步要求各外交机构应及时销毁所有往来档案,只保留近一个月的书信往来。

1928年初,为了保全苏联驻华各使领馆“免于彻底毁灭”,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李维诺夫不得不要求联共(布)政治局禁止共产国际在苏联驻外使领馆从事情报活动。^④同时,苏联也暂停除共产国际外其他苏联情报机关在华的一切活动。北京、上海、广州及哈尔滨等处的情报小组纷纷依照莫斯科的指示暂停活动,紧急转入地下潜伏状态。按苏联驻北京情报员维纳罗夫的说法:“早在布留赫尔的顾问团离开中国之前,情报小组就‘融化掉’并销声匿迹了。”^⑤许多苏联的情报小组只能伪装为各类进出口公司或商业协会方能在中国各大都市内继续秘密潜伏。作为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对外决策向来倚重各级的秘密情报网络所传递的信息。苏联情报机构在中国的窘况,使斯大林对当时中国的局势产生了极为悲观的预计,曾对莫洛托夫不无忧虑地表示:“中国将出现麻烦。”^⑥在自身情报组织遭到破坏之时,莫斯科曾一度寄望于作为共产国际情报网络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共各级组织。

但随着全国环境的恶化,那些原本能够配合苏联情报网络开展工作的中共组织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尤以东北地区为甚。经过多次打击后,中共在东北的党组织只好待在“躲避斗争的深渊”,变得“既经不起打击,也不堪斗争”。^⑦1928年底,中共满洲省委几乎被完全摧毁,“所剩者是有限定的一二而已”,整个东北的党组织都陷入瘫痪。^⑧随后成立的临时省委难以有效开展工作,“党组织如此微弱,在主要的产业群众中,十之八九没有党的组织,即使有党的组织,而

① 由于日本国内环境相当不利于情报工作的开展,所以以哈尔滨为中心的苏联情报组织便以东北为主要活动区域来收集日本相关的情报。然而,日本在1927年前相当长的时间内,严重低估了苏联在满洲的情报机关的能力。参见维·格·巴甫洛夫:《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悲剧》,谢云才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② “谢苗诺夫给某人(多半为别尔津)的信(1927年6月2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4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55页。

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8号记录(1927年7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37)》第4册,第415页。

④ Christopher Andrew and Julie Elknor, “Stalin and Foreign Intelligence,” pp. 69-94.

⑤ 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第236页。

⑥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9年10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⑦ “中共满洲省委通告第五号”,《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印,1988年,第44页。

⑧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信”,《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4月—1929年2月)》甲2册,第334页。

又多畏缩不能积极活动”，^① 勉强重建的党组织处于“原始小团体时代”。^② 东北地区中共组织的孱弱，在客观上进一步削弱了苏联的情报信息来源。由于承受多重压迫，苏联的“信息来源几乎丧失殆尽”，绝大部分地区的情报工作都需要重新建立，所有的信息管道需要重新疏通。^③ 可是，东北地区情报网络却始终难以重建，直到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爆发，才出现一丝转机。

在目睹苏联势力在东北的衰退后，张学良错误地认为莫斯科已没有决心和能力维护其远东利益。^④ 这个错误判断的直接后果便是东北军在与苏联红军的较量中一败涂地，间接后果则是给了苏联与中共势力在东北重建的机会。期间，斯大林开始考虑此刻中国工作的重心应该立即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甚至曾考虑组建并派遣由中国人组成的两个步兵旅前往东北地区，扩大队伍，占领都市，继而建立革命政权。^⑤ 除了这种较冒险的武装斗争策略外，苏联隐匿多时的情报网又重新开始活动。为了加强相关工作，共产国际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不久便决定派遣“一位负责的中国同志，就中共满洲的任务对中共中央作出指导”，还要求“在莫斯科各类学校动员50名中国同志，派他们去东方加强北满的工作，还要吸收在苏联远东的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参加这项工作”。^⑥

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中共满洲省委开始秘密在被苏联俘获的奉军士兵中发展组织。^⑦ 在这些士兵被释放后，也尝试继续在他们中间维系与拓展新建立的联络网。^⑧ 此外，为了能围绕中东路问题开展更多的运动，共产国际远东局发出指示：要求在哈尔滨潜伏的地下人员重新开始行动，与中共取得联系，彼此协作来进行工作。^⑨ 中共满洲省委也不再满足于空喊口号的游行，而是积极响应苏联方面的指示，准备立即实际执行各类秘密任务。^⑩ 满洲省委曾乐观地认为：在中东路事件前后，由于战事的影响，东北地区斗争形势有很快的发展，党的组织成功地渗透进入

①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党务工作的报告（1929年4月）”，《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60页。

② “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计划草案”，《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3月—1929年10月）》甲3册，第87页。

③ 1928年1月6日，越飞在致索洛维耶夫的信中写道：“一次次事件显示，我们消息闭塞。目前信息来源几乎丧失殆尽。最重要的任务是让情报工作重新走上正轨。”维克托·乌索夫：《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第240页。

④ 中东路事件前，张学良曾在私人场合流露出他对苏联远东实力的不屑，他所收到的情报总是一厢情愿地把苏联内部描写得困难重重，才使他敢于主动挑起冲突。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04页。

⑤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9年10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册，第187页。

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4号记录（1929年9月13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册，第164页。

⑦ “中共满洲省委给联共（布）远东边疆委员会的信（1930年1月1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册，第28页；“皮亚特尼茨基给佩列佩奇科的信（1930年4月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册，第89—90页。

⑧ “刘少奇给黄平的信（1930年1月1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册，第24页；“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3月14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1月—1930年4月）》甲4册，第267—268页。

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29年10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8册，第190页。

⑩ “中共满洲省委给哈尔滨市委的信（1929年12月28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1月—1930年4月）》甲4册，第87—88页。

各地，甚至包括以往力量薄弱的南满地区。^①但出人意料的是，整个形势却在1930年3月后急转直下。

当时，由于满洲省委内部爆发了针对托洛斯基机会主义取消派的内部斗争，最后导致中东路大罢工运动未能成功发动，继而错过了使满洲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爆发起来”的最好时机。^②紧接着，省委又遭受更严重的打击——1930年4月9日省委9名成员均遭逮捕。随后几天间，各地又有30余人被捕，满洲党团省委几乎完全瓦解。这次挫折使满洲省委此后长期一蹶不振，难以恢复元气。^③1930年底，遭多次镇压后的满洲党根本无法配合苏联在东北开展任何工作，况且还缺乏通晓俄语的人员，莫斯科获取情报的管道重新被堵死了。^④

面对满洲的困境，由于缺乏其他的情报来源（尤其是日本方面的情报来源），^⑤莫斯科一直急于重新在东北建立信息管道，开始计划直接与满洲省委取得联系以便配合苏联在东北地区的地下工作。紧急重建后的满洲省委也指出，“和苏联建立直接关系问题，非常迫切”，因为“苏联在满洲有他们的军事工作，但他们都是经过特务路线”，缺乏最为直接的军事援助。^⑥但是，满洲省委大部分地方组织不可能在短时间重建，反而在如南满等地区进一步萎缩。^⑦1931年初，满洲省委甚至未能选出代表参加全国苏维埃大会。^⑧“万宝山事件”发生两个月后，由于基层组织的瓦解，省委只能从报纸上得到相关消息，根本谈不上向中共中央或莫斯科传递什么有价值的信息。^⑨

迫于严峻的局势，苏联只得暂时搁置东北地区的重建计划，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关内的共产运动尤其是江西苏区的发展上，继而希望通过在中国境内建立共产革命政权的方式来牵制中国

- ① “目下满洲斗争形势正在很快的发展，不但中东路以及哈市斗争日有变化，即素来消沉的南满洲和北宁路、南满路、抚顺以及沈阳的兵工厂和官厅雇员，都继续不断的爆发或酝酿着许多斗争……至于形成此种现状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战争”。见于“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2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1月—1930年4月）》甲4册，第119页。
- ② “刘少奇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1930年3月13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1月—1930年4月）》甲4册，第207—264页；另可参见辽宁社会科学院编：《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
- ③ “中共满洲省临委给中央的满字第五十八号报告（1930年4月24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1月—1930年4月）》甲4册，第359—360页。
- ④ “中共满洲省地方党部调查表（1930年8月）”，《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5月—1930年10月）》甲5册，第294—296页。
- ⑤ 苏联在日本本土及朝鲜的情报网络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并未真正得以建立，至少尚处于人员物色、培养和组织健全的初始阶段。1927年，苏联情报部门驻汉城负责人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奇恰耶夫虽已招募了一名日本军官，但围绕此人所建立的间谍小组直到1932年后才开始向莫斯科输送情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该名日本军官也是苏联在日本境内唯一的日本籍间谍。正是由于痛感对日情报工作不力，莫斯科方面才于1933年派遣理查·佐尔格去日本本土负责建立一个真正有组织的情报网络。参见维·格·巴甫洛夫：《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悲剧》，第297—300页。
- ⑥ “中共满洲总行军委报告第二号（1930年10月7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10月—1930年12月）》甲6册，第19—20页。
- ⑦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南满工作大纲（1930年12月）”，《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10月—1930年12月）》甲6册，第365页。
- ⑧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1月7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1月—1931年4月）》甲7册，第11—12页。
- ⑨ “团满洲省委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并准备进攻苏联问题的信（1931年7月10日）”，《东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4月—1931年7月）》甲8册，第291页。

境内的各派反苏势力。正当瑞金的苏维埃政府即将成立之际,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再一次搅乱了莫斯科的战略部署,亦迫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审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外交政策。

三、“让帝国主义者争吵起来”:苏联对中国东北局势的误判

在缺乏准确情报的情况下,联共(布)政治局特别成立由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和加拉罕组成的委员会,研究各国对待事变的真实态度。然而,该委员会却只能通过阅读世界各大报刊上与此事变有关的报道来了解事态发展。^①两天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向斯大林呈交一份事态简报。^②通过对各国媒体报道的分析,他们认为西方列强都未采取积极态度,日本则可能为出兵北满寻找借口。^③虽然,加拉罕的情报搜集工作尚在进行中,但紧张的局势已迫使莫斯科不得不尽快做出外交决策。^④9月23日,斯大林在接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简报仅一天后,就立刻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并做出指示。

首先,斯大林并不认为日本当局计划通过武力手段彻底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他甚至怀疑日本的行动很可能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或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⑤其次,他甚至认为日本不仅有可能得到帝国主义者的默许,很可能还“征得中国某些有影响军阀集团,如冯玉祥或阎锡山集团,或张作霖的老奉天分子同意,或所有这些集团的同意进行武装干涉”。^⑥基于此判断,斯大林进一步指出苏联“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他担心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激烈反应可能会引起欧美列强的不满与关注,因为这“只能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起来”。^⑦为贯彻此方针,斯大林具体地要求:一方面《真理报》应抨击日本的侵略行径,另一方面《消息报》则要“使用温和的和极其谨慎的语调”以免刺激日本及其他国家。^⑧虽然此时的斯大林依旧不清楚东北地区的实际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3号记录(1931年9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31页。

② “Решения ПБ От 20.09.31 Г.,” Протокол № 63 За сессия ПБ От 20 Сентября 1931 Г., Melbourne Gateway to Research on Soviet History (<http://www.melgrosh.unimelb.edu.au/>), Номер де а (File number): Ф. 17. Оп. 3. Д. 849.

③ “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31年9月2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34页。

④ 直到10月2日,加拉罕才根据满洲边境苏联边防军的观察情报向联共(布)政治局正式呈交最新的报告,但莫斯科却早已做出了外交决断。

⑤ “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1931年9月2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36页。另参见“Решения ПБ От 20.09.31 Г.,” Протокол № 63 За сессия ПБ От 20 Сентября 1931 Г., Melbourne Gateway to Research on Soviet History, Номер де а (File number): Ф. 17. Оп. 3. Д. 849.

⑥ “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1931年9月2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36—37页。

⑦ “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1931年9月2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36页。

⑧ “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1931年9月2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36—37页。《真理报》与《消息报》关于事变的报道也引起了中国舆论的注意,谓“日侵东北将激起国际战争,对俄有重大危机不能不注意”、“国联无法解决,中国急宜自决”,参见《苏俄两报抨击日本》,《中央日报》1931年10月9日,第3版。

局势，甚至也并不知晓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但他却已为苏联定下了中立、不干涉的处理基调。

9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意见通过相关决议，责成外交人民委员会再一次向苏联驻华和驻日外交代表作出明确指示：他们必须向莫斯科及时通报发生的事件；没有莫斯科的指示不得采取任何步骤，也不作任何解释。^① 政治局还进一步指出：针对中东铁路的一切行为都应该从现有条约出发，断不可擅自发表对中日冲突的看法。^② 虽然斯大林做出了“不干涉”的决定，但在面对中国方面时，依旧制造苏联可能会进行干涉的假象以避免莫斯科的底牌过早被中日方面所察知。驻哈尔滨的苏联外交人员曾私下对奉军表示：“在事件扩大时即以武力解决，中东路防范严密日人无逞能余地。”^③ 在得知日军暂停向哈尔滨进军并通知苏联其行动限于南满东蒙的消息后，蒋介石立刻认定此乃“俄外委李维诺夫向日本大使作口头警告之结果”。^④

截至9月底，日军已占领沈阳、长春、抚顺、营口、凤凰城等地。10月初，日军不顾英美等国的反对，开始持续轰炸锦州。同月底，日本关东军准备以讨伐马占山为名出兵北满，企图占领齐齐哈尔。日军若占领齐齐哈尔必须经过中东铁路，所以就可能与苏联发生正面冲突。美国驻长春领事也认为日军占领宽城子后，若继续向北推进，势必会极大地刺激苏联。^⑤ 然而，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莫斯科依旧坚持之前的判断，遵照斯大林所制定的政策行事。耐人寻味的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共产国际虽然号召各国共产党在宣传舆论上声讨日本挑起事端，但又特别强调“整个运动应与反对战争威胁集合起来”，而不应沦为单纯的反日斗争。^⑥ 同时，共产国际还指出应该从“帝国主义矛盾进一步升级激化的角度”来研究分析日军入侵满洲的行动。^⑦

11月14日，日军攻占齐齐哈尔的前夕，李维诺夫不厌其烦地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一再保证：苏联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不会援助中国军队。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赴任途中，曾途经西伯利亚，事后亦证实：过俄时似无军事动员迹象。^⑧ 日本驻哈尔滨总领馆在观察苏联近期的反应后，向东京报告称：苏联没有与日本正面对抗的决心。11月15日，共产国际在给各国共产党关于满洲问题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应负战争责任的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通过帝国主义强盗的联盟即国际联盟准备重新瓜分中国的并同意发动这场战争的英、法、美帝国主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4号记录（1931年9月2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38页；另参见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RGASPI), Номер дела 17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162/11, 39, 47, 49, 68, 98.

②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4号记录（1931年9月2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38页。

③ “王瑞华为报中东路理事会就日本出兵东北与苏联重要人物谈话内容致张惠景代电（1931年9月23日）”，《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第351—352页。

④ “1931年9月2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2册，台北：“国史馆”，2006年，第103页。

⑤ “The Minister in China (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iping, October 8, 1931, 1 p. m),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1. The Far East: Volume III (1931)*, pp. 140-141.

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87号记录（1931年10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43—44页。

⑦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满洲问题的非常会议速记记录（1931年10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60页。

⑧ 《德使陶德曼昨接见记者》，《大公报》，1931年10月4日，第4版。

义”，所以苏联不会在此时轻举妄动。^① 19日，日军第二师团进占齐齐哈尔。直至此时，莫斯科仍相信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单方面挑起的军事冒险，继续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23日，联共（布）政治局专门成立由斯大林亲自担任主席的特别外事委员会以应付随时可能降临的国际帝国主义威胁。^②

有鉴于此，除了宣示“不干涉”的中立立场，莫斯科方面还进一步试图与日本改善外交关系，甚至不惜在中国东北问题上采取妥协默许的态度。1931年12月初，李维诺夫特别召见由法国返日接任犬养毅内阁外交大臣而在莫斯科中途停留的芳泽谦吉，向其提议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以防止西方列强通过各类手段来恶化苏日关系。^③ 对此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苏联的这项提议等于变相承认了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希望以此换取苏联远东地区免受日本的直接威胁。这类看法主要是基于当时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仍很薄弱的认识，认为其需要通过妥协的方式来换取远东边境的安全。^④ 但是，此类解释却多带有后见之明的嫌疑。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苏联、日本在远东真实的实力对比，或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重新评估。

其一，1931年事变爆发时，苏联远东军力是否真的如此脆弱，以至于难以应付日本可能的进犯呢？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⑤

早在中东路事件之前，苏联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兵力便不可小觑，大致拥有3个步兵师与2个独立骑兵旅，合计约2万余人。^⑥ 1929年8月，为了应付与张学良的军事冲突，苏联整编设立“特别远东集团军”，其主力除原有的3个步兵师外，又新增了2个步兵师，总兵力达4万余人。^⑦ 与之相对，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在东北地区驻扎的关东军总兵力仅为1个师团；另有驻南满铁路特别守备队，主要任务为保卫“关东州”与南满铁路，野战兵力有限。^⑧ 根据奉军于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常设反战委员会关于满洲问题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1931年11月1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73页。

② 该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奥尔忠尼启则，参见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RGASPI), Номер дела 17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162/11, 39, 40, 49, 68, 98, 99, 101, 107, 111, 169.

③ 此前，苏联曾分别于1926年8月和1927年5月先后向日本建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但均遭拒绝。

④ Rana Mitter 在其著作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中亦采纳此类观点，认为苏联坐视日军侵占黑龙江正是由于其远东实力的极端脆弱。

⑤ 即便是当时的日军高层亦不敢低估苏联的军事实力。根据日陆军参谋本部1931年1月的报告，日方判断苏联当时的常设军力有71个步兵师、3个装甲师、12个骑兵师，并推测苏联在战争初期即可动员多达650万人的庞大兵力。参见“蘇連邦陸、空軍軍備参考表”。（《陸軍省大日記參謀本部軍縮關係・秘別冊第1号付録100部の内第7号・列国陸、空軍軍備参考》，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C08052037900）

⑥ Шталь Александр Викторович, *Малые войн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Terra Fantastica, Город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3, pp. 171-173.

⑦ 事变爆发时，苏联远东特别军主力部队分别为第21步兵师、第35步兵师、第36步兵师、太平洋第1步兵师、阿穆尔第2步兵师、第5独立骑兵旅及第9独立骑兵旅。具体部署情况可参见 Robert G. Poirier and Albert Z. Conner, *The Red Army Order of Battle i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Including Data from 1919 to Postwar Years*, Novato: Presidio Press, 1985.

⑧ 九一八事变前，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定，驻防“关东州”的师团每两年轮换一次，兵力以一个师团为限。关东军编制的固定化与扩大化则是发生在1932年以后。事变前，驻防“关东州”的为第二师团。参见

1929 年底所进行的调查, 日军在东北地区的常驻兵力约 1.2 万人左右, 分别驻扎于旅顺、辽阳、长春、海城、铁岭、奉天、连山关、公主岭、大石桥、柳树屯。^① 事变爆发后, 日本驻朝鲜军虽然擅自进入东北增援, 但日军总数仍只有 3 万余人。^② 除此之外, 苏共中央政治局早在 10 月 2 日便已做出调动远东红军的备战部署。^③

在事变爆发初期, 苏军在远东的战力并不弱于当时驻扎东北地区的日军。^④ 10 月中旬, 苏军在与中国辽宁、吉林接壤的边境地区就部署 2 个步兵师与 1 个步兵旅 (计 5 个步兵团、3 个骑兵团、2 个炮兵团, 另配有飞机 50 架、坦克 13 辆);^⑤ 当时, 在同区域内的日军野战兵力仅为一个非满员师团 (计 5 个步兵联队)。^⑥ 此外, 苏军在 1929 年中东路事件中迅猛的出击已给日军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称其“与列强军队无异”, 战力不可低估, 并认为: 训练有素的红军与行动迟缓的沙俄军队不可同日而语。^⑦ 况且, 此时的日军还要对付残余的东北军, 至少难以在短时间内对苏联的远东地区构成实质性威胁。^⑧

其二, 尽管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攻占东北地区的大片地区, 但整个局势直到 1931 年底仍不明朗。

当时, 在东北地区的日军约 3 万余人, 但关内的东北军主力仍有近十余万之众。同时, 黑龙江马占山近万人的部队仍十分活跃, 对日军的侧后方造成重大威胁。自 10 月起, 关东军与东北军一直对峙于锦州沿线, 并未能如先前那般疯狂推进。而在日本政府内部, 关于事变到底应该如何收场, 始终未有定论, 主张通过谈判解决的呼声日渐高涨。^⑨ 即便是在“无视东京指令”

① 李惠等编:《侵华日军序列沿革》,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 第 15—19 页。

② “日本在东北驻军地点数目调查表 (1929 年 11 月)”, 《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 (五)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 第 37 页。

③ 1931 年 12 月 31 日前, 已增援至东北的日本部队包括有: 第 29 旅团 (隶第二十师团)、混成第 4 旅团 (隶第八师团)、混成第 8 旅团 (隶第十师团) 及混成第 38 旅团 (隶第十九师团), 合计约 2.8 万人。参见北平绥靖公署参谋处编:《九一八以来日军在东北行动概要》(1932 年 7 月 1 日), 中央档案馆、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及吉林社会科学院编:《九·一八事变》,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年, 第 112—115 页。

④ “Решения пб От 02.10.31 Г,” Протокол № 67 заседания ПБ от 5 октября 1931 г, Melbourne Gateway to Research on Soviet History, Номер дела: Ф. 17. Оп. 3. Д. 852.

⑤ Шта л А лександр Викторович, Ма лые войн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Terra Fantastica, Город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3, pp. 191-193.

⑥ 需要指出的是, 日军高层所研判的苏军数量远高于此。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 当时的苏军在西伯利亚以东部署有 8 个师; 若发生军事冲突, 那么苏军可在百日内向中苏边境调集至少 20 个师的兵力。参见《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 (1931 年 11 月 16 日)》,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侵华资料长编 (上卷) ——〈大本营陆军部〉摘译》, 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第 203—204 页。

⑦ “王瑞华为抄送关于日军侵占辽吉后俄境沿海情况报告书致张惠景代电 (1931 年 10 月 28 日)”, 辽宁省档案馆编:《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 (六)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下》,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第 32—33 页。

⑧ 林三郎编著:《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室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第 21—22 页。实际上, 经过近十年的重新武装, 苏联红军在人员素质和战备水平上, 确有大程度的跃升, 相关研究可参见 Шта л А лександр Викторович, Ма лые войн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Terra Fantastica, Город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3.

⑨ 此时期苏联驻远东的军力配属情况另可参见“С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военный конфликт (1929 г.),” Россия и СССР в войнах XX века, Г. Ф. Кривошеев,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1.

⑩ 许多日本政府官员都担心事变若迟迟得不到解决可能会愈加不可收拾, 此外“万一日军推进至北满,

的关东军内部，也存有较大分歧。因为有相当部分的关东军将校认为发动事变的主要目标应是解决旅大的租借问题，而非武装占领整个东北。^① 所以，此时的东北局势仍然相当微妙，日本远未控制整个地区，更谈不上直接威胁苏联的远东边境。整个事态的急转突变则要等到1932年1月初张学良宣布放弃锦州，东北军全部撤入关内之后。^② 在此之前，无论是莫斯科还是东京，都未必能准确料想到关东军如此轻而易举地占领整个东三省，甚至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功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③

12月1日，应斯大林的要求，加拉罕与李维诺夫在政治局会议上通报了满洲事变以来的情况，但并未谈及日军是否有彻底并长期占领满洲的危险。^④ 由于莫斯科此前对局势的严重误判，在1931年12月向日本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苏联很可能根本没有预计到九一八事变的最终结局。

实际上，苏联驻远东的军事力量远未脆弱到难以保卫其国境安全的地步，不仅在短时间内能够应付进犯，甚至还能威慑日军在北满的行动。比如在进攻齐齐哈尔前，日军参谋本部事前曾特别指示前线部队：为大局着想，作战时不要利用中东铁路，避免刺激苏军导致其进行干预。^⑤ 11月2日，再度向关东军发出严厉指示：“鉴于内外大局，无论以何等理由，断不允许部队越过嫩江、远向北进。”^⑥ 另根据时任奉天省政府谘议王子衡的说法：“北满因为有苏联的关系，日寇一时不便进军，曾在1931年底秘会张景惠，让他速回哈尔滨，维护地方治安，保护日本侨民。”^⑦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席卷东北之时，日军仍力图避免与苏联之间爆发不必要的武装冲突。^⑧

① 则将与俄国发生冲突，事态更趋严重”，参见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② 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即旅大地区。根据日俄战争后签订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旅顺的租借即将于1932年到期。日本方面普遍认为奉行民族主义政策的国民政府及东北地方当局很可能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所以出现了部分关东军官佐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以保障旅大的租借权。

③ 张学良主动弃守锦州的决定完全出乎关东军的预料。此前，关东军内部普遍认为不经过一场血战很难攻占由东北军主力防守的锦州，他们甚至为发动进攻而集结大批坦克部队。所以，东北军若能在锦州象征性地予以抵抗都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关东军在锦州前线遭遇大规模的武装抵抗，那么就很可能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因为关东军是在违背政府命令的情况坚持行动，想要继续战斗就必须不断获得胜利。倘若遭遇坚决的抵抗，就很可能导致关东军彻底丧失行动的合法性，使得整个战事难以为继。

④ 当时之情景，即便是日本政府恐也难以揣测关东军下一步的行动。九一八事变始终都是关东军自导自演，若槻内阁事前不知情。之后，接任首相的犬养毅内阁，在上任之初就曾遣密使赴华讨论和谈事宜。但是，当时日本政府既无法掌控前线的军事行动，也难以贯彻其政治决策，在事变处理过程中完全陷入被动。相关研究可参见黄自进：《犬养毅与九一八事变》，《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6年第25期，第311—335页。

⑤ Прот око л/В 78 За сѣдѣнїя Пб От 1 Декабря 1931 Г., Melbourne Gateway to Research on Soviet History, Номер де а: Ф. 17. Оп. 3. Д. 863.

⑥ 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田琪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⑦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侵华资料长编（上卷）——〈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202页。

⑧ “王子衡检举张景惠的材料（1954年5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7页。

⑧ 当时，不仅是日军担心事变会引起苏军干预，张学良在事变之初同样担忧苏军可能会“趁火打劫”，唯恐其在中东路沿线有所行动，电令“不惟不宜与俄方发生齟齬”，“亦应稍为牺牲以全其大务，与俄方

综上所述,在1932年之前,日军尚不足以对苏联边境构成直接威胁,对远东安全的担忧并不能成为莫斯科急于和东京签署《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充分理由。相反,此时的莫斯科则是主动与日本协调彼此在满洲的利益。^①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苏联向日本提出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同时,联共(布)政治局在斯大林的主持下,已于12月23日做出了最新决议,即“应尽一切手段消除远东地区的战争危险”。^②

那么真正使斯大林做出这项决定的实际原因除了情报缺失所造成的误判外,是否还存在别的因素呢?^③在回答这个疑问前,我们可能有必要了解当时苏联对外政策的历史背景以及斯大林处理相关问题的既有模式。

四、警戒与避战:斯大林的决策逻辑及其外交行为

1929年中东路事件前夕,法国外交部官员就曾在非正式场合告诫当时驻法的顾维钧:苏俄虽会力避与西方国家的直接冲突,但在满洲问题上则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另根据法方所掌握的情报,“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都是绰有余裕的”,所以“如果莫斯科由于受任何刺激而被迫行动的话,它是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明确有力的反应”。^④法方的分析准确地指出了当时苏联对外政策的两个关键所在:其一,莫斯科希望力避与列强的正面冲突,主要通过各种非军事手段周旋之;其二,苏联对自身的国家安全始终给予最大的关切并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众所周知,由于经历过惨烈内战与外国武装干涉,自夺取政权之初苏联当局就始终担心帝国主义列强会再度联手围剿新生的革命政权。为化解这种危险,苏联在苏波战争结束后,开始逐步放弃通过战争手段来发动“世界革命”的理念,转而采取较为缓和的外交手段来摆脱孤立。在整个1920年代间,苏联与中国、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土耳其、芬兰、波斯、阿富汗等周边邻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还先后取得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等资本主义列强的外交承认。

此后,紧张的国际环境虽有所缓和,但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依旧秉持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和平基础必然是极为脆弱的。^⑤斯大林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有可能开始趋缓,出现一种较为平静的表面状态;但是,

① 切实联络是所至要”。参见“张学良为确息日军已中止赴哈我护路军暂缓撤退等事致东特区长官公署等电(1931年9月23日)”,《辽宁省档案馆藏张学良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第355—356页。

① Boris Slavinsky, *The Japanese-Soviet Neutrality Pact: A Diplomatic History, 1941-1945*,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13-15.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RGASPI), Номер де л 17/162/11, 10, 101.

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向日本试探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同时,也在与中国进行复交问题的接触,似有通过这两方面的外交努力来稳定整个远东形势的考量。早在10月中旬,苏联政府便向南京方面明确表示“甚盼早定方针,因共商应付之道”,参见《邵元冲日记》于1931年10月17日的相关记述(邵元冲:《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85页)。

④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01—402页。

⑤ Douglas W. Blum, “The Soviet Foreign Policy Belief System: Beliefs,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Outcom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1993, pp. 373-394.

世界各地的帝国主义列强“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①他谈论最多的国际问题始终是如何防范帝国主义国家随时可能发动的联合进攻，又如何避免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全面战争。^②在处理具体的国家安全事务时，斯大林表现出一种谨慎的政治策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苏联诸多相关决策正显露出他的这种决策风格。^③

事变之初，由于情报信息网络的瓦解，莫斯科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掌握东北地区的动向。在此情况下，对事态的判断，自然会比较倾向遵循着过往政策的惯性来处理。^④长久以来，一直难以摆脱国家安全忧虑的苏联最高决策层，很容易将这类行为看作是帝国主义联合威胁苏联的前奏继而“有可能引起对苏联的直接军事进攻，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正企图通过军事挑衅的手法把在中国的战争演变为同苏联的战争”。^⑤此外，斯大林一贯谨慎的特点，进一步加剧了苏联当局对事变性质的严重误判——认定这不是日本单方面的行为，亦未曾料到关东军确有侵占东北全境的企图。于是，他才会做出放弃武装干涉的决定。另一方面，可能正是出于阻止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包围苏联急先锋的考虑，莫斯科方面才会在1931年底就急于提出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1932年1月，日军攻占锦州后，挥兵北上试图彻底击溃抗日武装并企图进攻哈尔滨。面对日军的进逼，苏联非但未加干涉，还允许日军通过中东铁路运兵，或许也是为了签署条约而向日方展示的诚意。^⑥

然而，苏联的外交退让并没有换来日本人的合作，相反却进一步刺激其野心。当日本政府发现包括苏联在内的列强无意制衡日本时，便再没有理由去约束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态度也逐渐从反对转为默许，继而公开支持。随着伪满洲国的正式成立，莫斯科才逐步意识到放任日本在东北行动的严重后果。在彻底控制东北后，日军立刻开始进一步大举增兵。截至1932年4月，关东军已从1个师团的常设编制迅速扩充到5个师团，另辖5个独立守备队、3个混成旅团及2个骑兵旅团，总兵力迅速增至10万人左右。同时，日军也开始秘密为对苏作战进行备战，并积极收集相关备战之情报。^⑦与之相对，由于错失时机，莫斯科在此期间却几乎没有向远东增援一兵一卒。^⑧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苏联当局对事变发展做出误判，以致未能及时进行全面的政治动员与军事准备，从而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时至1932年，日苏军力在远东地区的平衡逐渐被

①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6页。

② 关于斯大林外交思想理论的相关分析，可参见李玉君：《论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外交政策》，《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第69—76页。

③ 譬如在处理1945年后国共内战的问题上，斯大林对是否支持中共亦常有反复，但在“举棋不定”的表象后却隐藏着明确而贯彻始终的目标，即保障苏联的远东安全与利益。

④ Douglas W. Blum, "The Soviet Foreign Policy Belief System: Beliefs,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Outcomes," pp. 373-394.

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常设反战委员会关于满洲问题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1931年11月1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73页。

⑥ 除上述表达诚意的行为外，斯大林甚至还曾在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要求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工农红军情报总局禁止在满洲进行地下特务工作时的“胡作非为”，因为这会导致与日本爆发新的摩擦。参见“斯大林至卡冈诺维奇的信”，转引自A. M. 斯拉乌茨卡娅：《哈尔滨—东京—莫斯科：一个苏联外交官女儿的回忆》，裴列夫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57页。

⑦ “北满特務機関長に与える指示、訓令送付の件”，《满密大日記1932年》第14册，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C01002762800。

⑧ 截至1932年4月，驻扎东北的日军师团分别为第二师团、第八师团、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及第二十师团，另驻有第1至第5独立守备队，混成第4、第8、第38旅团，骑兵第1、4旅团。详情可参见李惠等编：《侵华日军序列沿革》，第19—20页。

打破，日本对苏联构成的实际威胁直到此时才真正变得迫在眉睫。

如果说苏联此前对日军军事行动的姑息主要是为避免苏联成为列强的众矢之的，那么在此之后苏联的退让则是迫于东北地区的既成事实，售卖中东路已是无可奈何的选择。1932年底，时任德国驻日本大使冯·狄克森在谈及中东路售卖问题时指出：苏联宁愿承受外交不利，即激怒美、法、中等国，以摆脱日本日益强大的军事压力。莫斯科愿意就出售铁路进行谈判，也表明了中东铁路管理之混乱无力。李维诺夫认为：为了摆脱日本在满洲对苏联形成的包围，放弃中东路亦是值得的，即使如此会暴露苏联的软弱并且对苏联长期外交政策不利。^①

五、结 论

本文认为苏联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东北局势采取“不干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当时情报的缺失所致。当然，作为即时性因素的情报缺失并非是导致“不干涉政策”的唯一原因，苏联长期以来的外交特性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探究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真实态度及其导致的结果，不仅是为了重构更接近事实的历史情境，同样也是为了通过此例证来重新检视当时苏联外交的基本策略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我们分析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就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于中苏、日苏的关系上，而是应当将当时整体的国际情势与苏联长期以来的外交特性均纳入考量的范围。

自始至终，斯大林在外交领域所追求的是国家安全，希望尽可能在周边地区营造有利的外交态势。但他也深知，单凭苏联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在短期内达到此目标，只能利用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来开辟有利的国际环境。^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苏联才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立刻向日本提出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多年后，在处理苏德关系时，类似的外交思维仍旧主导莫斯科的决策层。^③1939年前，苏联为应付纳粹德国的崛起，一直奉行与西方国家合作的集体安全路线。然而，当斯大林认为集体安全难以切实保障苏联免遭战争威胁时，便又断然转向德国摇动橄榄枝，最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④在远东，苏联的外交策略基本上大致一直遵循相似的套路。这就是为什么苏联采取时而大力援助中国，时而向日本妥协的灵活政策。

〔作者沙青青，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31〕

（责任编辑：姚玉民 焦 兵）

① 郭恒钰、罗梅君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许达菲、孙善豪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154页。

② 金重远：《苏联外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2期，第2—7页。

③ Robert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0, pp. 223-225.

④ 关于二战前苏德关系演变的研究可参见陈晖：《1933—1941年的苏德关系》，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CONTENTS [WT]

Research Articles

Law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Ptolemaic Egypt

Guo Zilin (4)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aws of Pharaonic Egypt, Greece and other parts of the Near East, Ptolemaic Egypt implemented two legal systems, one applied to local Egyptians and the other to immigrants. Little conflict occurred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However, in the event of any problem that neither system could solve or a situation that threatened the interests of the king and the ruling class, the king would act as an arbiter and issue decrees or edicts targeting the specific problem or situation. In this way, the two systems were in effect in harmony. This applies to Ptolemaic judicial organs, judicial proceedings and adjudication. This kind of legal and judicial system to a large extent protected the interests of the weak, punished wrongdoers and maintained the stability of society. However, the Ptolemaic law was alway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king and embodied his personal wishes.

A Reinterpretation of Soviet Policy toward Japan Around the Time of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Sha Qingqing (19)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the Japanese, who had provoked the incident, Zhang Zuolin, who headed the Fengtian warlord clique, and the Nanjing authorities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Moscow's diplomatic stance. Although the Central Eastern Railway faced a serious threat from the Japanese army, the Soviet Union still adopted a "non-intervention policy," sitting by and watching as the Japanese occupied the whole of Northeast China. After 1932, the Soviet Union took the first opportunity to recognize "Manchukuo" and began negotiations with Japan about the sale of the railway. Th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taken by Stalin and the top Soviet authorities were related to the gradual emergence of the Soviet diplomatic model as well as to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In addition, they were also influenced by such historical details as lack of information and failure to correctly judge the future.

Making Religion a Cold War Weapon—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the Buddhist Countries of Southeast Asia

Zhang Yang (34)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had adopted a Cold War strategy of using all means except war to weaken communism, a strategy continued by later administr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East-West confrontation, the authors of the policy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used religion as a weapon to unite countries in the intermediate zone against communism. During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mplemented a psychological warfare project as part of its efforts to contain China in the Buddhist countries of